

目 录

普华电灯公司创办经过·····	何纪英(1)
接任普华电灯公司经理前后·····	张有才(14)
光明火柴公司简述·····	陆雨之(19)
温州棉织业史略·····	谢联璧(22)
解放前温州的酱园·····	陆雨之(34)
浙南近代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	黄省初(37)
西山造纸厂及吴百亨的其他企业·····	吴 杰(44)
郭浣湘在温州的矿务和贸易活动·····	郭霞飞(49)
温州纸伞·····	郑加琛(53)
瓯绣·····	谢联璧(61)
瓯绸·····	冯举千(64)
一个被遗忘的行业——铜锡器业	
·····冯叔礼 秦锦涛口述 郑加琛整理	(67)
毛笔业忆昔·····	张叔霞(77)
温州木炭业盛衰记·····	夏超群(79)
瓯江流域的木材业·····	叶汉龙 徐咏衡(86)
温州茶业记略·····	陆雨之(93)
漫话国药业·····	金梦良(99)
山货行兴衰史·····	张叔霞(113)

历史上的温台航务贸易·····	吴 杰(118)
英美石油公司在温州争夺市场纪实 ·····	陈于滨 李渭钧资料 苏虹整理(123)
温州航运业概况·····	吴 杰(130)
十三班内幕·····	陈于滨 王泽侯(136)
解放前温州钱庄业见闻·····	曾慧中(150)
瓯海实业银行简史·····	汪惺时(162)
旧中国银行温州支行与钱庄·····	王书之(166)
钱庄业大倒闭风潮前后·····	张叔霞(171)
上海闻人徐寄庾·····	汪远涵(174)
先父周守良事略·····	周善同(184)
翁来科在金融界的活动·····	陆雨之(189)
南北货业忆旧·····	蔡仲瑜(195)
瓯柑与温桔·····	谢联璧 陆雨之(208)
柑饼行业漫忆·····	张叔霞(214)
水果居间业·····	林陈连(217)
闽货居间业与福建会馆·····	翁春仙(225)
先父蔡冠夫二三事·····	蔡仲瑜(230)
解放前三大食品店的竞争·····	夏仲逵(236)
百年老店五味和·····	张叔霞(247)
英美烟草公司在温州的经营活动 ·····	陈守庸口述 王孟冶记录(251)
叶德昌南北货店的兴衰·····	张叔霞(258)
金三益绸缎局及其经营特色·····	陆雨之(263)
温州菜馆业及其他·····	杨苏流(267)
温州鱼商业的变革·····	洪作殿(273)

永嘉工商友谊会组织始末.....	干焕章(281)
永嘉钱业夥友会.....	徐伯铸(287)
老锦霞布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柴青青 冯 坚(292)
《东瓯百咏》选介.....	陈宣崇(297)
来函照登.....	(301)
后记.....	(302)

普华电灯公司创办经过

何 纪 英 遗 作

电灯公司创办初期

1912年，宁波人王香谷想在温州筹办电灯公司，就在小南门外双莲桥下购地建起一幢楼房（5间），作为办公室。王香谷系药业出身，人颇能干，只是经济不宽裕，因此，想在宁波同乡中招募股份。当时，宁波人在温州营业虽较繁盛，但因王当时资信不高，结果无人投资，而建筑工料费却急需付款，终于因招股困难，加上他因事急于还乡，不得已只好登报招顶。

这时，李湄川、何醒南邀同高俊青、何啸秋、董仁山商议，一致认为温州是座重要城市，要繁荣市场，非办电灯不可；再说，办电灯是公共事业，既做了好事，又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当即推选李、何与王香谷洽谈，终于以5千元（一说3千元）收买成约。但在筹募资金中，却遭到与王香谷同样的困难，温州城内无人愿意投资，只得向乡下亲友劝募。先后招来张伯卿、项茗斋、张迭生、林芹周、朱翼同等人。经开股东会，定股金为5万元，取名为“普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公推李湄川、何醒南为正副经理。

翌年春，李湄川、何啸秋邀同对沪商情较熟悉的贾楚玉，同赴上海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奇异牌100瓩透平发电机和魏廷敦牌卧式锅炉，共要银3万余两，分期付款；同时，聘请美籍

必齐尔为工程师，月薪 300 元，订约一年。厂房则建在办公室后面。

到了冬季，机器运来了，由必工程师指导安装，并由职工分工插柱放线装灯。但当插柱放线至小南城内时，却遇到了阻力，有的市民认为电流危险，会导致火灾，会使人触电致死，因而竭力阻止工人插柱。次日，必工程师与工人同往，步定插柱距离后，即令工人插柱放线，市民们因惧怕洋人，没人上前阻拦。

当时规定凡报装电灯，均为 25 支光一盏，从傍晚发电至午夜熄灭，每月电费一元。开始时无人报装，后来决定凡报装者赠送电料，报装者仍寥寥无几。预定 300 盏，结果仅艺文学校和教会等报装。

发电后面临的困境

一切安排就绪后，决定于 1914 年农历三月初一正式发电。早一天，必工程师突然通知厂方：必须付清机器欠款 4 千元，否则，不准发电；他还将发电机前的煤精拿走作为要挟。当时，厂里资金不足，建厂的各项工程均需付款，钱庄虽有二三家，但不肯贷款，平日开支，仅赖几人到乡间借款维持。此刻，促襟见肘，穷态毕露，不得已，只好由董仁山、何醒南奔赴郭溪借款，幸得张伯卿设法协助，董、何携款返城，得以如期发电。

三月初一这天，恰逢城里大街举行“拦街福”，五马街口的宁台旅馆也择是日开张。旅馆为了招徕顾客，特从门口直至室内，装设临时电灯 200 余盏。当电厂输电后，真是火树银花，光彩耀眼，霎时，人山人海，争看电灯。从这天起，温州城里

开始有了电灯。

此后，报装电灯的日渐增多，直增至千余盏，局面较前稳定多了。宓工程师期约满后，厂里改聘许仲贤为工程师，并陆续对外招股，将股东代借款也作为股份加入，至1921年，共计股金8万元。自发电后，所需电量年年增加，厂里也略有盈利；但由于业务扩大后，管理工作没有改善，职员大都是股东或他们的亲戚，管理更加困难；当事者也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渐至厂内出现吸大烟、打麻将等现象。随后，窃电者日益增多，政府当局不仅不支持厂方，反而跟着欠费、窃电。1922年，因灯光暗淡，有的用户擅自将110伏灯泡改为40伏，仍惨淡无光，西门外一带用户甚至拒付电费，致使厂里收入减少。

是年夏，股东会议商讨议决，按比例增资，添购机器，即向裕平公司添购蕩益吉400瓩透平发电机和拔柏葛锅炉。至1923年冬，裕平公司机器抵沪，迭催付款，而股东却因历年未有利润，增资信心不大，大都观望不前；厚康钱庄汪惺良虽认股9千元，亦踌躇不付。市民对灯光暗淡，迭有烦言。在此情况下，经理李湄川不得不让位给杨雨农，由吕文起为董事长，自己则以“协理”名义支原薪（50元）退职。

杨雨农接任公司经理

1924年4月杨雨农接任后，规定厂里有盈利时，以老股作普通股，每年股息8厘，新增股作优先股，每年股息1分；老股东代借款项，3年内不准提现。当时新增股份7万元，连同老股合计15万元。

杨雨农募足新股后，即召开股东会修改各项章程，由吕文起为董事长，徐致江为办事董事，潘鉴宗、赵悦群、高俊青、林

湘庵、李志竞、黄筱山、董仁山、项茗斋、何纪英为董事，黄伯蕴、郭绩任、诸丽生、叶叔眉、张伯卿为监察。何丽川与李涓川均为协理，遇经理杨雨农外出时，由协理代行经理职务，平时协理无需办公，等于支取干薪。

股东会后，即着手建筑厂房、烟囱等，安装机器全包给上海俞金记。所用材料大都是外货，如火砖、水泥等，连机房铺设的地砖也是德国货，均由裕平公司代办，并派寿林文工程师负责指导。寿工程师不但善于绘图设计，有时还亲自动手装置。公司曾要求他代为设计线路，他表示，如能每月付给300元工资，则愿离开裕平公司。后因数额过大而未遂，仅受聘为顾问工程师。

由于业务扩大，于是公司分设总务、工务、材料、会计、业务等部门，由林醒民为总务兼文书，翁传葆为会计，林芹周管材料，阮善良管工务，华云龙为机房管理员，同时添用了一些职员。并决定输电时间改为12小时，采用电表制，每度电价2角7分。

公司改组后开幕时，送灯料千盏，厂内外装上五彩电灯，光芒四射，颇为壮观。官商各界纷纷送礼，镜棚缎幛均有，并大肆摆酒唱戏，实属铺张浪费，业务收入虽有所增加，但仍得不偿失。此后，业务有了一些扩大，管理也比以前好，但开支浩大，且窃电者仍多，收入仍无多大盈余。1927年北伐军到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公司阮善良、严雨人联系组织了工会，但不久国民党进行“清党”大屠杀时，阮、严亦遭关押，后获释，辞去公司职务。

1928年董事会推赵悦群为经理，何纪英为协理，杨雨农为董事长，吕维周、董仁山为办事董事。后因赵悦群不就职，仍由杨雨农兼经理。翌年，董事会推吕维周为经理，杨雨农为办

事董事，并加入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浙江分会，聘任许仲贤为总工程师。

改用柴油机，实行电表制

加入电业联合会后，曾组织人员到外地各厂参观访问，嗣后管理工作有些改善，业务也有了发展。由于用户逐年增加，发电量供应不上，尤以寒冬腊月为甚，股东会议决再增招“优先股”15万元，连同原有股金合计30万元。当时，煤炭运输费用较大，一次需购千余吨，还得雇民轮运载，贮藏地点和资金周转都有困难。若要零星购买，则价格更高，机房建筑费也大，发电12小时，最高负荷仅能承受三四小时，停机开机十分不便。因此，董事会决定改用柴油机。

为此，特由杨雨农、许仲贤赴沪，向翔华公司购进道司牌200匹马力柴油机全套。7月份发电后效果颇好。于是，11月份杨、许再次赴沪，向孟阿恩公司订购500匹马力柴油机全套两部，并同时添建了各路变压所，改善高低压线路。为了防止窃电，于1931年1月废除了原有的“包灯制”，改为装电表，电表由公司统一供应，规定：一、用户缴纳保证金；二、分期交款；三、每月电表租金2角。电表均用铁匣子装置，接电线加套铁管子，改装后窃电现象大为减少。9月间，500匹柴油机安装完毕发电，透平机即停止发电。

1933年股东会议决：废除经理协理制，实行董事制。以杨雨农为董事长，吕维周为副董事长，常务董事五人：杨雨农（兼总务科主任）、董仁山（兼工务科主任）、汪惺良（兼总稽核）、黄筱仙（兼总检查）、何纪英（兼营业科主任）。董事叶叔眉、郭绩任、李湄川、赵悦群、李志竞、高福滋，监察汪惺时、翁

来科、徐颢侯、黄伯蕴、朱翼周、张伯卿、戴绶先。这时起电费减为每度2角4分，采用新式簿记，每天收取电费，改变原来月终才能结算的办法。并免费装设路灯3000盏。5月份起分区逐段馈送日电，并开始对工业供给用电，电价每度1角3分。至于农民排灌用电，虽多方设法购来5至40匹马达租给用户，但报装者却寥寥无几，仅锯木、碾米等70匹马力，日电只开200匹油机，仍未满载，同预计相差较远。

这时期，因公司购买机器、建变压所和添建办公室等支出甚巨，又要分配股息红利，负债甚多，资金周转困难。股东会决定发行公司债券10万元，以便偿还债务。公司债券以电费为担保，每月作还本付息之用。在分发股息红利中，搭发公司债券，还在红利中提取一些年终时给职工发双薪。这时期采取的措施较多，各方面也有了一些改进。

但是，当时工作中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采用董事制后，表面上似较民主，各有专责，实际上在外兼职多，没有按时办公，具体事务多系各股主任处理。凡兼科主任的也没在传票上盖章，当时购进材料较多，均系上海康福公司代办，需要时去信叫买，价格也不加审查，柴油多是在温州购买，都由董事长掌握。

1500匹柴油机的添置

1934年，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在温州开会。这年，正是公司创建20周年，趁此举行纪念大会。各地电厂代表约百人参加，公司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职工们还演剧招待。会后，邀请各代表到仙岩、江心屿、雁荡等地游览。

1936年因用电增加，原有的500匹柴油机，时常发生故障，

用电高峰时常受影响。股东会又增资15万元，由杨雨农、翁来科、董仁山、何纪英与工程师许仲贤一起赴沪添购新机器，时孟阿恩公司有一台6只缸1500匹柴油机全套，对本厂尚为适用，只是该公司需现款购买，机款约需20万元，还得购变压器、原机配件，机房建筑安装也要四五万元。因此，只有分期付款才能办得成。当时，另一家“慎昌”洋行，有一台4只缸1000匹马力柴油机全套，可以分期付款。在两家外商竞争下，孟阿恩公司只得作了让步，答应机款减少5%，并可分期付款，但要有上海保家。因款数较大，无人承保，最后由杨、翁、董、何四人个人作保，才将机器买下。

翌年3月，机器运到温州，孟阿恩公司派德籍工程师前来指导安装，10月才安装好发电。至此，公司计有透平机2台，柴油机4台，合计2400瓩。

当1500匹柴油机发电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日机时常飞温轰炸，为了保护机器，特在机房顶漆上德国国旗。后来敌机骚扰频繁，线路时遭破坏，即时派人抢救。接着迁往乡下——东岙办公，傍晚赶回发电并收电费，全县照明并未受到影响。

日寇骚扰，公司困难重重

抗战爆发后，日寇对沿海实行封锁，柴油来源渐少，价格渐高，而币值却日益贬低，加上先用电后付款，致使公司陷于亏损。这时，政府当局又以400瓩烟囱目标太大（高13.5丈），下令拆除，以搬迁委员会名义将200匹柴油机全套、电表千只以及电线搬往丽水。当时答应给价1万元，直至两年后，经再三要求才付给。

1939年3月底，公司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1500匹柴油机

傍晚开机时，发电机突然爆炸，一片飞上机房顶，一片落在地上，碎片飞向四处，当场打死工人包惠和。董事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机房管理员鲁书声开机时不在场，仅由值班黄德康等人开机，除上报公安局调查外，鲁、黄二人受到开除处理。对工人包惠和，除付给丧葬费，每月还付给抚恤费。同时，向孟阿恩公司提出抗议，停止每月应解的机器款。

公司原已资金不足，至此更是外强中干，6台机器仅两台500匹能发电，后开会要求董事代为借款，到会者却寥寥无几。柴油渐告断绝，虽改为12小时发电，尚难维持。有人提议用柏油与柴油掺用，经试验，效果尚好，以后逐渐增用。有时还用菜油、青油掺用，或用人造柴油，以此供应全城照明用电。但植物油价比柴油价高，电费加价又需经政府批准，加上纸币贬值，亏损日增，只好依靠变卖旧材料来维持。

1941年4月19日温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寇盘踞厂内，因事先已将库存材料疏散至池底和园底祠堂内，故损失较轻。日寇撤退后，仍以500匹两台发电。不久，发现弯地轴油眼有十字裂痕，一边继续发电，一边由许工程师赴沪商议修理办法。后因无法电焊和另制，于是改用400瓩透平机发电，以松柴为燃料，暂济燃眉之急。但因400瓩透平机停开已久，平日从未维修，锅炉管子大都腐蚀，烟囱又已拆除，库房也无存料，因而困难重重。当时有人建议造一较前次短6丈的高烟囱，再将透平机加以整修，并仿宁波电厂采用棉花子取代煤炭。是年10月试机，效果良好，至1942年温州第二次沦陷时，又被日寇拆去。

此次日寇撤退后，只好以油眼已裂的500匹两台发电，因植物油及人造柴油经常接济不上，经与李毓蒙、林普银洽商，将500匹机裂痕较小的一台，改用木炭发电，但仅开150瓩左

右。不久，另一台 500 匹油机地轴裂断，至此，全城照明仅能维持一部分，有些地方如府前街等处，均自备小型发电机。公司收入锐减，仍靠出卖材料度日，工人工资有时仅够维持本人伙食，多数员工自找出路。

张宝琛胁迫公司改组

1943年，专员张宝琛在专署召集公司董事开会，以公司“无经理负责，电灯不明”为借口，胁迫进行改组，杨雨农退为常务董事，让位与倪镇澜为经理（系长途电话局离职无事）。

倪镇澜于是年 6 月接任经理，专署秘书赵彬如以“树仁”名义入股为常务董事，方巽山为工程师，汪惺时为董事长，其余董事、监察大都没变动。招新股 60 万元，现金 1 元作 2 元计算，实际仅 30 万元；老股原为 45 万元，因过去从未升值，作为 90 万元计算，合计 150 万元。除少数职员外，大多数被解雇，新增职员大都认了股。

当时的人事安排：杨勤斋为总务科长，冯莅明为材料科长，钟某某为营业科长（以上 3 人均系长途电话局人员），何镇东为会计科长，汪雪滨为出纳，沈笃忱为工务科长。接着，由方巽山工程师拟具恢复发电计划，意欲以 1500 匹柴油机用斜齿传动 500 匹柴油机的发电机，因原有的发电机已损坏，故向福建南平铁工厂订制。1944 年运来一台生铁直齿轮，安装完毕时适值温州第三次沦陷前夕，经方工程师试验，引擎开动不到 5 分钟，齿轮就断裂了。次日即撤退至高楼，库存材料事前仍疏散至池底和园底祠堂，较好的材料由沈笃忱散存农民家里。

日寇盘踞城里后，白象一带也驻有敌军，为避免材料的损失，沈笃忱星夜雇船将祠堂里的材料抢运至高楼，留在祠堂里

的一些笨重材料，多遭敌人抢去或被坏人窃卖。公司一直难以摆脱多灾多难的处境。

抗战胜利后的苦挣扎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倪镇澜经理仍靠油眼已裂的 500 匹炭机发电，后来重改为柴油机，发电量也不够，如何恢复全城供电，仍无善策。公司入不敷出，还得靠出卖材料度日，有帐可查的约在百万元，甚至连地下管子也挖出卖掉。1947年2月，仅有的一台 500 匹柴油机弯地轴也断裂，至此，公司无声无息了。接着，倪镇澜辞职，由汪惺时董事长兼经理，原工务科长沈笃忱为副经理。

在 500 匹弯地轴断裂前，曾想按方工程师原计划，在沪订制 1500 匹传动齿轮，将直齿改为斜齿，生铁改为铸钢，委托上海中和公司承制。后到沪一了解，原来中和公司只是一写字间，并无工场。后又听说救济总署有机器配售，遂备文说明温州无电情况，请求配售机器，承陈守庸奔走呼吁，终于购进 1700 匹柴油机全套，计价 5 万余美金。如此巨款，公司实难承受，经请求救济总署，答应由上海保家具保后分期付款，但第一期款必须即付，公司向各行庄商借，并变卖了一台 200 KVA 变压器才算了事。

随后，公司决定增资 5 亿元（当时纸币已贬值），向沪、温招募新股，结果，在沪募得 1.3 亿余元，在温募得 2 亿余元，尚缺 1.5 亿元。1947年9月，机器到沪，立即前往搬运。这时，又聘张有才为经理，认股 1 亿元，聘陆雨之为副经理，认股 5 千万元，沈笃忱为副经理，吕人麟为驻厂监察，何纪英为驻厂常务董事。

张有才就任经理后，即赴沪了解搬机情况，并聘请陈正盛工程师指导安装。经勘察后，决定安装在100瓩透平机房内，要求一个月内安装完毕。当时因人少事多，复电事宜大都连夜赶办，于是着手添用职工。同时，原线路大都破坏，西门一带已无电柱，立即抓紧整理和恢复。1948年1月，停电长达10个月的温州城，终于恢复供电。

温州全城恢复供电后，又遇到诸多困难：公司负债10亿元左右，利息支出大；币值狂跌，要调整电价得政府当局批准；油机零件如油接头、汽缸等时常损坏，修配价格昂贵。因此，开支浩大。好在当时报购柴油每月达千吨，发电12小时，实际耗油仅30余吨，因此，将多余柴油出售，以资弥补。为了便于购买零件和出售柴油，特在沪设立办事处，另帐登记，以资查考。

出售柴油属投机倒把行为，日子一久，渐为外人所知。公司虽请客送礼，极尽笼络之能事，仍难满足其要求，遇到推荐人员，便得录用，仅一年左右时间，职工多达150余人，还被方又圆诈去柴油好几吨。窃电情况仍常发生，政府人员、地方士绅、报馆、警察、伤兵则公开窃电，公司也无可奈何，致使用电高峰逐渐增多，机器常出故障，往往全城陷入黑暗。

这时，又想利用1500匹引擎用齿轮传动两台500匹的发电机，据工程师葛尚宸说，上海新中工程公司设备较好，可能会制造。于是，董事会派人到新中观察，该厂设备较好，工场也大，决定订制，但后来试用又遭失败。

温州电灯公司，从1914年发电，历时30余载，仅有6台机器，计2400瓩。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加上管理不善，6台机器破坏殆尽；至温州解放时，仅余一台不完整的、快速度的1700匹柴油机，仅开12小时，且常发生故障。解放后，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温州电业才走上了日益发展、欣欣向荣的道路。

1963年6月8日

董仁山补记：

清末民初，宁波籍商人在温经商为数甚多，大多聚居于大南门外花柳塘、虞师里一带。当时宁波城内已有电灯，市民叫好，而温州却仍是煤油灯天下，对经商极为不便。宁波人王香谷萌发了创办电灯公司念头，他经营中药材，对药材鉴别富有经验，是同业中的老前辈。他办事很能干，只是财力不足，当时在温的宁波商有200余人，且业务发达，他认为招募数万股金，诚属易事。可是，他的预料错了，许多宁波商对此持冷漠态度，他们认为身边若有百元存款，可做千元生意，何必冒险去入股；再说，办电灯是温州地方公共事业，宁波人是客居，犯不着挑这担子。经各方面劝说，使王香谷心灰意冷，最后，以“要事还乡”为名，把全部不动产登报削价招顶。

温州人李涓川、何醒南等向王香谷收买后，即筹募资金，置办、安装机器。在安装线路电杆时，遭到群众的反对，尤其是小南门头至登选坊一段，沿街商人聚众阻止，其理由是，电杆装在店边，夜里小偷会缘电杆爬入，要电灯公司负责，并写给保证书。事态发展，闹了许久，地方官出面规劝，也无济于事。后来，工头把情况向美籍必齐尔工程师汇报，他听后大为恼怒。第二天，他偕同工头等人到闹事地点观察后，由小南门到登选坊，步行往返两次，每走数十步，即用粉笔画一符号，并嘱咐工人开掘，闹事群众见洋人出马，渐渐散去，一场插柱风波终告平息。但整个安装工程进度很慢，直拖至1914年（民

国三年）内外线始安装完毕。

于是，择定农历3月1日夜放电。这时，正值温州民间习俗，有“拦街福”之举，沿街悬灯结彩，迎神赛会，极为热闹。放电消息一传出，城乡人民奔走相告，外地群众倍增。这天适逢宁商经营的宁台新旅馆开张，门口装有数百盏大小灯炮，放电后全城电炬照耀，光芒四射，温州市民久居油灯之下，忽见电灯照明，有如重见天日。

接任普华电灯公司经理前后

张有才

温州普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华）从1912年开办后的30多年中，经历了许多波折。到了1946年，由于资金亏损，设备损坏，停止供电一段时间，一到夜晚整个城市漆黑一团，受到用户的普遍谴责。

后来，正副董事长杨雨农、翁来科，经理汪惺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向救济总署配购一套1700瓩发电设备。但是价款无着，筹措困难。他们曾打算进行改组，并增资5亿元，只是那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不如商，商不如囤”，普华增资又碰到了重重困难。

1947年，杨雨农、翁来科看中了我。我原在温州开设信隆商行，经营煤油、棉纱、棉布，自任经理。同时，我又是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驻温代表，在当时商界里算得上一个“兜得转”的人物。杨、翁认为我是工商界后起之秀，路子宽，头寸灵活。这年9月底的一天，杨雨农请客，特邀我参加，酒后，他和翁来科要我留下，提出聘我当普华经理的事，并要求我在5亿元增资中负责筹募3亿元。

当时我想，各地电厂经理，大都是豪绅巨商充任，自己若能担任此职，就可凭借我同美孚、德士古、亚细亚三大煤油公司关系，以电厂名义，多搞到配给的平价柴油。然后，以小部